



中央苏区的植树运动

□ 邱明

从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中央苏区连续三年春季开展了植树运动，并把每年4月5日清明节确定为“植树节”。

毛泽东号召“农村中每人植树十株”

尽管中央苏区反“围剿”战火不断，苏维埃政权建设千头万绪，但是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仍然十分重视植树工作，号召苏区干部抓紧时间绿化荒山，保护生态，发展经济。1932年3月1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农民委员会第十次常会通过决议案，决定“实行普遍的植树运动”，发布在当天出版的《红色中华》报上。1932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成立一周年纪念向全体选民工作报告书中规定，“每年春季举行植树运动”。1933年2月13日，土地人民委员部发布关于春耕计划的第二号训令时要求，“河堤坝圳旁边要种植树木，原有树木不准砍伐，留以巩固堤岸”。1934年1月24日至25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作工作报告，谈及经济建设时指出：“应当发起植树运动，号召农村中每人植树十株。”

中央苏区开展植树运动，其主要目的是：广植树木来保障河坝，防止水灾旱灾，并且植树还能保护道路，有益环境卫生；解决日常需用燃料（如木柴木炭）；增加果物生产，增加群众经济收入；开发空山荒地。

苏维埃政府采取一系列有力举措，扎实推进植树运动。一是由各级政府向群众广泛宣传，说明植树的好处，发动群众种植各类树木。二是在沿河两岸及大路两旁，均遍种各种树木，在适宜种树的荒山，尽可能植树造林，并要求广场空地都必须种树。三是由各区政府考察某地某山适合栽种树木，通告群众选择种子。四是为了保护森林和树木发育，春夏之时禁止随意采伐，免伤树木。五是用劳动竞赛方式鼓动群众，注意培育树木种子，在每年春天进行植树运动。从中可以看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进行治国理政的试验探索中，已经具有朴素的绿色环保意识。

不去“上坟”，而去种树

中央苏区将植树运动与破

除封建迷信相结合，努力实现移风易俗。

1932年4月5日是清明节，也是中央苏区的第一个植树节，少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青年实话》当天刊发社论《提倡植树运动》，号召每一个少先队员、儿童团团员“不去‘上坟’，而去种树”。清明节农村中不少人都要祭祖宗、扫坟墓、烧香点烛。中央苏区在清明节发起植树运动，倡导文明新风。各级共青团组织事先在群众中作宣传解释，并定下种树的区域，到植树这一天集合起来，每人种一棵树，按行排列种得整齐，就像农民插秧一样。而且，团员青年宣传植树运动、反对封建迷信时，是耐心地向工农劳苦群众进行说服教育，而不是强迫禁止他们扫墓祭祖，极大地尊重了当地百姓的风俗习惯。

在党和政府号召下，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到植树运动中来，许多青年妇女、少年儿童走出家门，和壮年男子一起植树造林，参加春耕生产，为增加收成而奋斗。还有人创作了《植树歌》，刊登在《青年实话》上：“（一）清明天气，真真好，大家快来种树呀！发展山林的生产，改善工农生活！（二）植树利益，你晓得么？能防水旱的灾祸，巩固河堤且避暑，木材果品又多。（三）硬木砍来斟梭标，又做枪壳又做炮，整齐武装上前线，粉碎敌人‘围剿’。”

植树运动蔚然成风

在中央苏区的努力下，植树成为一个经常的群众性运动，取得明显成效。

一是植树运动组织有序。苏区各乡设立植树委员会，由乡苏代表及群众积极分子组成，有的村还组织分会。该委员会负责植树的宣传计划与布置动员。所有苏区农村劳动群众在有场地的情况下，每人植树五株以上，注意培植。植树运动成绩突出，据《红色中华》报记载，截止1934年5月，瑞金植树60.37万棵，兴国植树38.98万棵，多山的福建植树21.38万棵、种了木梓种子1699斤。

二是科学植树日渐普及。《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等中央苏区党报党刊刊登了《植树的方法》《植树的益处》等文章，对栽种、插枝、栽秧等方法作了详细说明，对植树的用处、时令、种苗等作了详细介绍，宣传普及科学知识。各地开展铲山和植树运动周活动，对经济价值大的木梓、竹山周围的杂树盘枝，全部砍干净，以利于竹木生长。铲山时严禁炼山，土地人民委员部在春耕检查时对会昌高排一区普遍烧山的现象进行了严厉批评。

三是保护树木深入人心。在二苏大会上，军委直属队在提案中建议：“多植树木，保护森林，禁止任意砍伐树木。”为此，人民委员会专门制定颁布了保护山林条例，对保护山林作出详细规定，凡违反条例规定、任意砍伐树木的进行处罚。比如，按照树价加倍赔偿给该项树木的所有者；砍伐树木的主要负责人处以一个月以上的强迫劳动；如因砍伐树木而发生严重的情形者，处以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的监禁；各级政府如不负责人随便批准砍伐树木，依照前项处罚之。

四是生态效益初步显现。1934年9月，《红色中华》报记者采访土地人民委员部负责人时发现，苏区与白区形成两个世界的鲜明对照。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今年是遭受着普遍的灾荒，‘六十年未有的水灾’，再加上一百年未有的旱灾’，使今年的秋收完全绝望。数万万的灾民辗转于饥饿残废的环境中”。而在苏区，由于开荒植树、兴修水利，水土流失少，生态环境好转，中央苏区这一年不仅战胜了罕见的旱灾和虫害，而且农业收成比上一年增加一成左右。

铁心向党的“铁流后卫”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邱华林 朱一华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革命烈士纪念碑坐落在江西省宁都县城会同乡。纪念碑坐西朝东，由碑座、碑身组成，四周用花岗岩石材围护，建筑面积约100平方米。碑身正面镌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革命烈士纪念碑”，背面刻有“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字样。碑座刻有碑文，内容如下：

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领导下，于宁都县城举行起义加入红军。是月16日，在宁都固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下辖第十三、十四、十五军3个军，为红一方面军增加了一个主力军团，为中国工农红军增添了一只劲旅。

1932年3月起，红五军团先后参加过赣州、漳州、南雄水口和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等战役，战功卓著。1933年5月，红五军团第十五军改编为第十三师。1934年8月，第十三师进驻广昌驿前通向宁都的铁梯山、刘桂峰等阵地，是月29日，连续击退敌4个师的进攻，部队伤亡三百余人。宁都群众从阵地抬回大量伤员，集中于会同下村救治，后有许多重伤员牺牲，葬于会同下村山坡上。2002年果农修路发现烈士遗骸和“红十五军”刻字遗迹。

长征途中，红五军团负责掩护中央和军委纵队转移，赢得“铁流后卫”称誉。1936年1月，红五军团改编为红五军，同年11月编入西路军。1937年1月，红五军在甘肃高台与六倍之敌激战九昼夜，因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

红五军团为人民军队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为告慰先烈英灵，弘扬革命精神，谨立碑铭志。

革命先烈永垂不朽！

宁都县人民政府立
二〇一四年五月

碑文介绍了红五军团的成立和悲壮历程，深切表达了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之情，读来令人动容、催人奋进。

宁都起义为红军增添劲旅

中原大战失败后，冯玉祥的西北军第5路军被蒋介石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1931年，第26路军被派往江西“剿共”，失败后孤军驻守宁都。在红军和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双重围困下，第26路军进不可攻、退不可守，兵无斗志、士气低落。党组织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派王超等同志通过各种方式潜入第26路军，与该军的地下党员刘振亚取得联系，成立了中共特支，军中的统战工作有了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一些在思想上向党组织靠拢的官兵被发展为党员，党组织逐渐壮大，领导力量进一步加强。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多为北方人的第26路军官兵厌恶内战、要求抗日的呼声更加强烈了，纷纷写请愿书，要求“回北方，打日本”。第26路军官兵的这一腔报国热情却遭到蒋介石的无情训斥。中共特支对此因势利导，一方面积极沟通，真诚团结了一批以参谋长赵博生为代表的中高级军官；另一方面在军中扩大宣传，赢得了更多基层官兵的真心支持。12月初，中共特支在获取蒋介石要求彻查第26路军内共产党员的电文后，随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提前起义的准备工作。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等率所部官兵在宁都起义，宣布加入红军，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宁都起义的成功，有力打击了坚持内战、不愿抗日的蒋介石集团，同时还壮大了红军队伍，促进了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

多次参战大显威名

1932年2月，红五军团第一次参战，就立下赫赫战功。当时红三军团正围攻赣州，由于红军装备不足、双方火力悬殊、久攻不下之时，敌各路援军又纷纷赶到，红三军团处于被包围的险境。迫在眉睫的生死时刻，毛泽东急调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上前增援，董振堂率领红13军疾驰赣州、杀入战场，众将士手握大刀一顿猛

砍，开辟出撤退的通道，使红三军团脱离险境，保护了宝贵的革命力量。

随后，红五军团又参与了漳州、南雄水口、黄狮渡等战役和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在中央苏区周边一路纵横驰骋，大显威名。如南雄水口之战，这是红五军团首次独立作战，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罕见的恶战。1932年7月9日，国民党军以10个团的优势兵力向红五军团第13军阵地正面发起猛烈反扑，经连续冲击，红13军几乎陷于绝境。在生死关头，红13军全体将士发扬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抡起大刀与敌肉搏，始终牢牢坚守在阵地之上。为了巩固阵地，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亲率四五千名手持大刀的勇士，分四路与敌展开白刃战。据战后统计，有近千名粤军倒在红五军团战士的大刀之下。此役，红五军团一举击溃广东军阀8个团，稳定了中央苏区南翼，为红军主力部队尔后在北线作战解除了后顾之忧。

长征中的“铁流后卫”

长征中，红五军团作为全军的后卫，以铁心向党、英勇无畏的精神，在中央纵队的身后筑起了一道血肉长城，掩护中央纵队顺利突围，被誉为“铁流后卫”。

湘江战役中，红五军团第34师在掩护最后一支队伍渡过湘江后，因遭到敌军合围，被阻隔在湘江东岸，陷入孤军作战的重重包围之中，5000多名官兵大部分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宁死不屈当俘虏，趁敌不备强忍剧痛把自己肠子绞断，牺牲时年仅29岁。红五军团以巨大牺牲和顽强斗志掩护了中央纵队和主力红军安全渡过湘江。抢渡金沙江时，不足5000人的红五军团奉命在距离江边90里处的石板河阻击敌人。他们在崇山峻岭中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林 宁

住的时候，也不轻易让别的医生替换他，而是经常会使用冷水清醒法，叫人提一桶冰冷的水进手术室，一头扎进水里清醒一下，很快又继续手术。

白求恩生前参加的最后一场战斗是1939年10月的涞源县摩天岭战斗，这次战地抢救充分展现了他坚决做完最后一位重伤员手术再转移的极端尽职。他率领医疗队把手术室设在战斗中心地带孙家庄村边的小庙里。战斗的第二天下午，日军分几路向孙家庄袭来，最快的一路会在40分钟后到达。司令部紧急通知正在紧张手术的白求恩停止手术立即转移。当得知还有10名等待急救手术的重伤员，白求恩没有停止手术，而是命令再增加两个手术台，一次抬进3名伤员同时手术。激烈的机枪声越来越近，当他做完最后一位伤员手术，刚刚随伤员转到山沟里，敌人的先头部队就冲进了村庄。遭遇如此危险，他却笑着说：能为英勇的指战员做完手术，这是我最愉快的事情。

1939年11月8日，白求恩到达位于王家台村的一个团卫生队，距离战斗火线十余里。他在7天前一次为伤员做急救手术时受到致命感染，此时病情急剧加重，体温高达39.6度，躺在床上已无力开展工作，但仍坚守第一工作准则，硬要通讯员通知前方各战斗单位把伤员都转送这边来，并命令医生：遇有头部或腹部受伤的重伤员必须抬给他看，就是他睡着了也要叫醒他。

毫不留情批评不尽职行为。1938年9月15日，白求恩在晋察冀军区模范医院开幕典礼上发表演讲，他严肃地指出：“倘使我们中间有一个人不尽职，结果大家都要遭殃。”因此，我们在批评当中要毫不留情，要狠狠地批评一切个人虚荣心，不要管年纪、地位和资历，倘使它阻碍我们前进”。这里“虚荣心”所指的就是对医疗卫生工作不尽职的思想和行为。

因为医生、护士、护理员处于医治伤病员的第一线，平常也跟他们一起工作，不管大事小事，白求恩容不得他们

有半点不尽职的思想和行为，要求他们在一切的事情当中把伤病员放在最前头，“倘若你不把他看得重于自己，那么你不配在卫生部工作”。一次，他看到一个医生用手术刀削梨吃，立即把他推出手术室。一个医生用错误的方法给伤员上夹板，白求恩一把拿过夹板，重新给伤员上，然后训斥说：“如果在战场上犯这样的错误，无异于是对伤员的第二次伤害”。

对医疗卫生工作不尽职的领导者，不管职务高低，白求恩同样会毫不留情地给予批评。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叶青山就因药物采购疏于把关一事受到他的严厉批评。一次，白求恩检查军区卫生部从平津采购来的一批药物，发现常用的急救药采购不足，而不常用的药却积压很多。他大致看了药品采购清单便找到叶青山质问：据我在八路军中一年半之经验，只有一例病人我开了洋地黄（一种有效的强心药），可这次采购的洋地黄足够供应一个大部队。而制造普鲁软膏必需的液体石蜡却没有采购，这说明我们的工作不够有计划。对军区的药物采购计划把关是卫生部部长的职责所在。望着一脸怒气的白求恩，叶青山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

毫不含糊坚持书面报告工作。到晋察冀军区开始工作后，白求恩主动将每月亲自给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写一份工作报告作为分内大事，工作再忙也不落下。

对及时总结出适应游击战争环境的工作经验，白求恩在报告中往往以令人信服的论证方式来赢得聂荣臻的认可并支持推广。1938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白求恩第一次组建流动医疗队参加359旅组织的广灵至灵丘公路伏击战进行战地抢救，连续40个小时为71名重伤员



与敌人奋战数日，挡住了国民党军追兵的猛烈进攻，保障了中央纵队和主力红军全部安全渡过金沙江。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时，担任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第37团历经千辛万苦翻过雪山，刚到懋功县城东南的达维镇，还没来得及喘息和休整，就接到军委命令，要求他们原路返回盐坪一线，为会师部队担负警戒任务。该团官兵坚决听从党的指挥，没有任何怨言，忍着饥饿、顶着寒风大雪，再次翻越天险夹金山，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1936年1月，红五军团改称第5军，董振堂任军长。1936年10月长征胜利后，第5军编入西路军，西渡黄河参加了攻占山丹、临泽、高台等战斗。1937年1月12日，红5军在甘肃高台县城与6倍之敌苦战9昼夜，因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

做了手术，术后除两人外其余均转移到旅部医院继续治疗。12月5日，白求恩在旅部医院又抓紧对其中的63名伤员进行了复查，三分之一伤员术后无感染的结果令他非常兴奋。12月7日他在写给聂荣臻的月度工作报告中用大篇幅的文字总结论述了在这次战地抢救中流动医疗队工作带来的重要经验和启示。1939年2月，聂荣臻批准白求恩再次组建流动医疗队支援冀中地区，除了参加战斗进行战地抢救，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是帮助该地区建立流动医疗队。7月1日，白求恩结束冀中之行返回军区司令部后马上给聂荣臻写了月度工作报告，汇报在冀中“新建流动医疗队两个（吕正操将军和贺龙将军的部队各一个）”，并“希望我们建立起来的流动医疗队的范例能得到广泛推广”。

白求恩不尚空谈，在报告中向聂荣臻承诺的事项一定会兑现和回应，绝不推脱。到晋察冀军区之初，白求恩与聂荣臻谈论过依托军区模范医院筹建军区卫生学校一事，随后在月度工作报告中承诺帮助草拟一份军区卫生学校教学计划。后来因刚刚建成的军区模范医院毁于战火被迫转移，卫生学校成立一事就被耽搁下来。直到1939年初，聂荣臻决定在冀西山区重新筹建卫生学校，由延安来的江一真医生担任校长。白求恩一直记着当初的承诺，得知重新筹建之事后，在冀中战地利用战斗间隙收集了开办卫生学校的各种文件资料，还物色好了教员、专门编写了《外科教材》，返回冀西后亲手把这些交给了江一真。白求恩随后在写给聂荣臻的月度工作报告中一开篇就汇报了帮助筹建军区卫生学校的情况，可见他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态度。

